

江 门 文 史 资 料

第 八 辑 目 录

- 孙中山先生在江门轶事.....郑 卓 (1)
- 辛亥革命在江会.....谢公惠 (4)
- 江门商会五十年.....钟 伦 (12)
- 江门觉觉学校.....杨惠波 (28)
- 江门明善堂的前前后后.....简锡禧 (31)
- 陈波在江门黑社会的崛起及其罪恶活动.....叶少林 (36)
- 外海乡浚涌内幕.....陈一鸣 (55)
- 外海茶庵寺一瞥.....陈毓明 (61)
- 一行禅师与茶庵(寺).....黄兆纪 (63)
- 与吉鸿昌将军在一起的日子.....彭秋萍 (68)

孙中山先生在江门轶事

郑卓

一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曾两次到过江门。

第一次到江门是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当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不久，听陈少白说：江门茶庵寺住持慧真和尚，是一位深具大志有革命思想的人物。慧真和尚原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部下，洪秀全失败后就削发为僧，在韶关南华寺削度，以后奉六祖的佛经到江门茶庵寺作住持。由于慧真和尚精通医术，在江门外海一带，施医济贫，活人无数，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慧真和尚有很多徒弟，到处游方化缘，可以得到清政府的消息，具备着初步的情报网的雏型，这对革命也是很有利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结识这位革命志士，决心亲自和他面谈，便有第一次江门之行。

由陈少白的介绍，孙中山先生认识了慧真和尚。孙先生以民族大义说服了这位佛门前辈，慧真和尚由旧式的革命志士转为新式的革命志士，正式参加了兴中会。

孙中山先生第二次到江门，是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七日）那时候，江门茶庵寺的慧真和尚已争取了新宁（现为台山）的一位开明富商陈宜禧，陈军宜禧是兴建新宁路的主持人（这条短程铁路在日侵华期间，铁轨为日军拆掉作铁

火，路基也早已荡然无存了）孙中山先生觉得和陈宜禧亲自会晤很有必要，便亲自到江门，再转台山。当时同行的有陈少白、刘义（是清末黑旗军刘永福将军的得力干将，在广东南部及广西、安南一带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黄顺（孙中山先生之兄孙眉的义子）卢怡若（卢廉若的三弟，现在还活在澳门）等。我也随行。我们五人护卫孙中山先生，都带有手枪和炸弹；孙中山先生则乔装为行医的郎中，化名姓徐。

由于农历正月十五，茶庵寺香火很旺，进香的人多，我们推迟到正月十七日到达茶庵寺，在一间有秘密地下室的“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布下哨岗。

刚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发现山下来了一队清兵，为数三四十人。他即飞报上山。

一向很镇定的孙中山先生也感到意外。因为我们这一次行动是在高度秘密中进行的，是不是有内部人叛变？是不是间接走漏了消息？否则，为什么我们刚到茶庵寺就来了清兵？

我们当时采取紧急措施，由陈少白、刘义、黄顺护卫孙中山先生，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带路，走上茶庵寺后山的茂林深竹中的一条小路，绕到海边去。在那里有小船可以过海，准备在必要时从水路撤退。卢怡若（三哥）则前往台山。我则装作茶庵寺的“后生”，往山下探听消息。

我赶到山腰，发现数十个清兵护拥着几乘轿正在上山。轿子里坐的都是女眷。

根据我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经验，清兵出动围扑党人，决不会有女眷参加的。我立即将消息飞报回去。

不久，清兵数十人拥护着几乘轿子到了茶庵寺，原来几

个女眷是来茶庵寺进香的。

事后，据茶庵寺的和尚向进香的女眷和清兵打听，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

原来当时的江门，商业发达，与香港有火船往来，是水陆交通要道，所以有一营清朝的陆军驻守。营长当时叫“管带”。此外，在江门猪头山还有个炮台，炮台台长是外省人，与陆军营的管带，两家女眷都有往来，这两个“官太太”听说茶庵寺香火很旺，决定前来参神，也认为正月十五人多，选定正月十七才来。因茶庵寺在山区，她们的丈夫恐怕有“山贼”所以多派护兵保护，于是便使我们受了这次意外的虚惊。

孙中山先生、陈少白、刘义、黄顺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宿一晚，第二天陈宜禧派他的侄儿陈忠堂到茶庵寺来迎接，在江门搭火车过海。（当时的火车是开到轮渡上过海的）在对岸，党人刘载甫、海培正在等待。我们到牛环见到了陈宜禧。孙中山先生的口才很好，革命的理论使陈宜禧很信服，陈表示：自己年纪已老，要刘载甫和陈忠堂帮助兴中会的革命事业。（刘载甫在革命成功后，作过首位台山县县长）。

这是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事业过程中两次到江门的经纬。

满清推翻以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孙中山先生挂念着曾为革命立过功劳的老党人，准备到江门茶庵寺再去看望慧真和尚，但听说慧真和尚已圆寂，就打消了第三次到江门的主意。

事隔七十多年，这些事对我还记忆犹新，特写此以应江门政协文史资料的补白。

（一九八二年六月）

辛亥革命在江会

杂忆录之一

——谢公惠(遗稿)

编者按：这篇史料是已故省文史馆馆员、市政协委员谢公惠同志于1953年12月30日写下的遗稿。这篇原稿，向庄于其爱婿吕汝端老师处，最近由吕老师交来我文史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为刊出，以供史学界研究。在此，并向吕汝端老师致谢。

清末光、宣之间，（1908—1910）新会江门人的反清情绪，已相当激化了。学堂里的师生们起初喜谈太平天国革命故事，对洪秀全、冯云山，尤其是忠王李秀成、翼王石达开诸人的事迹津津乐道，思想感情上，都深致景仰。有关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士子们，几乎耳熟能详，特别是对起义诸英雄的诗文联语，每于课余之暇，或茶前酒后，唱咏不绝于口。有购得《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等小册子的，每互相传抄，作为谈资，几成公开的秘密。据邑耆施雨莲老师说，当时里村里有一位老农，曾因欠豪绅五钱银子的鱼塘地租，给捉到官里去，官府除榜示封塘外，还打了五十大板。老农负创归来后，对庄稼人说：“红头有日再来，我誓要入伙去，杀绝这班瘟官恶神，才泄我心头之恨。”新会人民对满清统治的痛恨，足见一斑。

当时高谈革命烈士的事迹，在人民群众中，一时成为风气。徐锡麟的刺杀恩铭，史坚如的谋杀德寿，吴樾、熊成基

等的谋刺载泽，与及秋瑾女士的鼓吹革命，广州方面温生财的枪毙孚琦、陈敬岳的奋击李准等等英雄事迹，广泛地流传开来。萍乡矿冶工人因响应同盟会策动的革命军在浏阳起事而被惨杀多人，这件事，尤其引起愤慨。至于对满清的专制、腐朽政治指斥，大有“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曾惜羽毛”（忠王李秀成诗句）的气概。当时青年志士，三五成群，站在街头上演讲革命的，已是司空见惯，地方的狗官们初时还没有怎样的干涉，捉拿“黑面党”（革命党）还是后一些时的事。不过在当时江会间，一般人只有“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朦胧的民族意识，没有其他什么政治主张，更没有什么准备武装起义的秘密组织。

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返日本后，把他所领导的兴中会与各革命党派实行联盟，改组为革命同盟会。它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纲领主要是反抗清政府的压迫和卖国，废除封建的专制独裁制度。这个纲领是符合当时中国人民，尤其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愿望的，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同盟会成立以后，一面努力宣传革命，在思想战线上与君主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到革命方面来；一面与向海外发展的三合会和以长江海域为活动地带的哥老会取得联络，以运动新军进行起义。

当时，原籍新会的美、澳、日、南洋各地的华侨参加同盟会在海外宣传革命和捐资助饷的大不乏人，古井、崖西各乡的尤多。外海的陈少白即为同盟会上层人物之一。而茶坑人梁启超那时却是一个保皇党的领袖，恰与陈少白成为对立的政治人物。新会三合会会员亦不少，以吴成、梁日东为最著名。

自1905年到1911年，六年当中，同盟会曾经组织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也即是黄花冈之役。这一役，差不多把同盟会的骨干都集合起来，做了一次冒险的决斗。新会外海的同盟会员陈少白，就参与过这一役的行动。那时党人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新会法界老前辈莫凤荪君时寓居省城仙湖街，曾就黄花冈一役前后数天所亲见亲闻的真人真事，以蝇头小楷，写了一篇“同胞好（？）记”，洋洋万余言，记得十分详尽而生动，可作黄花冈战役的诗史读。笔者当时也曾读过。事隔四十多年，今已多所遗忘，只记他所附录小诗十多首中，在咏红花冈的红花中有“血润红花特别红”之句，又咏黄花句云：“根植骷髏繁血蕊，渊明无此好花枝，”都为时传诵。莫君死后，此卷也散失了，很可惜！

广州起义，失败了，党人壮烈牺牲的相当多，给革命的损失很大。青年党人赵声的战死，损失了一个卓越的革命人员，尤堪惋惜。事后，粤督张鸣岐即大施恐怖，严密搜索党人及剪发民众。被捕杀的有几百人。

黄花冈一役之后，只就新会江门来说：赞成革命的人更加普遍。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中，公开地阅读《黄帝魂》《中国魂》《革命军》等书的越来越多。有些革命党人在城市里秘密组织地下机关，暗中贴“白帖”和反清的印刷文件了。所以在武汉起义前夕，江会革命党人便策动三合会中人在会城进行抗捐运动。首先捣拆了南门直街的酒捐局，朱紫街（亦名猪仔街）的屠捐局，随着拆毁了各项承捐机关。凡有“虎头牌”标志的、为人民群众素所憎恨的，都在拆毁之列。当地豪绅梁国土（浑名梁老虎）宜民桥的住屋也被焚

毁。当时民愤高涨，地方官也没奈何，邑人都引为大快。梁老虎及其眷属，则早从后门鼠窜，避匿到江门去。当时恶弁、捐棍及其他劣绅等，纷纷逃亡港澳。那是党人对地方政权一个正面打击，也可说是新会人颠覆满清王朝的先声。足见党人事前已有布置。粤督张鸣岐得报，随派亲信走狗吴宗禹统领大队人马到县镇压，捕杀三合会中人吴成，梁日东等五人，此外，不少的无罪平民，也被捉去了。邑人对吴宗禹怀着无比的仇恨。但革命党人潜伏在黄冲，三村，天马和江门近邻各乡，杜阮各地，积极准备伺机起事。

1911年11月9日（夏历九月十八日），广东党人在广州起义，粤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见大势已去，乌烟似地溜跑了。党人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宣告独立。新会闻风，立即响应反正。

先是党人黄明堂自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转移至新会杜阮乡组织民军密谋再举。黄明堂原是钦州人，对江会、四邑地方情形，不很熟悉。他在香港同盟会支部时，有人介绍杜阮乡人黄梓入会，黄明堂便偕同黄梓乔装返杜阮，勘察江会形势，认为杜阮是一个很好的四邑革命根据地，就决定在杜阮、井根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全权委托黄梓负责进行。黄梓奉委后，积极地在杜阮、井根及其他各地秘密发展革命队伍。第一，扩大三合会组织，作为革命基本动力，推井根人三合会首领李兰主其事。第二，结纳绿林豪客和联络地方团勇，加强革命实力，绿林中人李金泉、叶同登等负责联络。第三，团结各界人士，担任宣传，以资臂助。

广州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江会来了。当地的满清官吏虽然没有溜跑，但都已准备下场。夏历九月下旬，号称一个标的黄梓部队，由井根，由江尾，由附近各乡来到杜阮集中，

编为四个营另一个炸弹队（亦名敢死队），合约千人左右，统由黄明堂亲自率领，高举着“广东明字顺军第一标”的大旗，浩浩荡荡地由杜阮直趋江门。江门的欢迎代表早已在佛子坳鹄候，导至江门埠内，老百姓沿途围观如堵，欢呼声和炮竹声不绝于耳。埠内人家店户也悬挂红旗，燃放鞭炮，有万民欢悦，举国同庆景象。革命军总部和标司令部暂设黄家祠（即现紫茶小学地址），其余队伍分驻在埠内外的祠堂庙宇及公共局所。其时还有谭义、吴勉等两个标，和舒炳荣统带反正的缉私舰二十余艘，都已集中在江门，统归革命军总部指挥。江门商埠就此兵不血刃地宣告光复了。

各路民军汇集江门后，广东明字顺军总司令部和所属各标司令部，海军统领部等都出了安民布告，并派出宣讲人员分头演讲，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并讲述革命宗旨，申明军民纪律。同时，派员分赴各处原有机关进行接收。其时江门的满清官吏如巡警局长，江门千总等早已逃跑了，只留下一些中下级人员办理交代。所接收的，只是部份的旧档案和多少劣烂枪械而已。接收过来的员役弁丁，其愿意受收编归队，或愿回乡另谋生业的，各从其志。当时地方秩序倒是相当安静。

这时会城方面，县民也知时机到了，由学界发起联合绅商会议于马山陈文恭祠，决议响应省城独立，欢迎黄明堂民军入城，即派代表谭栋脚、黄跃门、施树森等到县署劝县知事朱雄反正。朱氏颇识大势，当场答允，并表示愿意派员到江门欢迎黄明堂入城主持政务。县民以朱雄到任甫一月对地方没有什么恶迹，便仍举朱继任县长。时参将赵月修已逃匿无踪。天马乡陈西屏，原为满清一个把总，平日颇为乡众信服，至是自动反正，率所属弁丁入城，收缴营弁枪械。翌

日，黄明堂和黄梓率领部分军民来城，县民踊跃欢迎，扯红旗，烧鞭炮，欢欣鼓舞情状，也如同江门一样。邑人老教育界李淡愚拟一门联，贴在他的寓居门首，作为对革命表示态度。联云：

“欢迎新政治，重见汉威仪。”

但也有一些人以为“红头再来，洪家做了新皇帝。”而无知妇孺，却叫“革命党”为“黑面党”，这是半音之转，以讹传讹，原没有什么恶意的。所见入城民军，约二、三百人。其中不少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但精神还相当好。枪枝是多式多样的，如烂肚蛇，猪仔脚，大口钯，六坎连，以及火绳鸟枪之类。较漂亮的，还算单响毛瑟。其余多是生锈废品。黄明堂称统领，进驻学宫。黄梓称二标四营营长，分驻城内县前街，府前街和西门一带，悬青天白日旗，用黄帝纪元，称四千六百〇九年。这个时候，邑民自动地纷纷剪去辫子的也不少。并将满清服装的马蹄袖的袍褂改成汉家常服，表示不甘做鞑虏奴才。有人作打油诗云：

“豚尾拖来几十秋，并刀一剪澈前羞；
牛蹄靴与马蹄袖，付与梨园饰沐猴。”

这也说明了邑人仇恨满清，人心思汉的心理，在民族意识上有进一步的表现。

其时，有邓汉荣者，原是轮船上的大伙，因曾在街边演说革命，被拿监禁，民军入城时被放出。他出狱后住在参将衙门，自称参府，与黄梓争雄。那时，邑中绅士分两派，有拥黄梓的，有拥邓汉荣的。明争暗斗，形成了两个军政小集团的对立。有三江人赵六也，据说原是一个无赖，常常在街头演说，宣传拥护邓汉荣，被人在县署照壁下枪杀。纠纷闹大了，绅士何勉（清光绪末科举人）因受牵涉，（传说他是案

里的重要嫌疑人物)逃亡多年,不敢返新会。

又有一个龙启瑞也自称统领,声称拥有三营人马,委出营长多人,其实空无所有。不久,省城恢复秩序,派令李孟哲到县为新会县长,是为反正后新会的第一任县长。这时,那些无兵司令,什么统领、营长,什么参谋副官,都去得无影无踪了。

李孟哲下车未久,即出示严禁“野猫”。文告里的警句有云:“昼伏夜行,生涯唯资皮肉;寡廉鲜耻,目的不外金钱。”又云:“暗藏春色,护花有铃,而潜通消息者,是曰“猫窝”。指引迷津,弄舌如簧,而分沾雨露者,厥名“猫线”。其结句云:“改邪归正,盖有待于女诫;移风易俗,是所望于男人。”文告一出,舆论哗然。士绅们亦以地方体面攸关,颇多微词。但当时的地方秩序逐步上了轨道。男女社交公开,主张自由恋爱,提倡改良婚姻,以及破除神权迷信,人人讲自由平等。妇女界尤积极提倡女权,争取参政,成了一时风尚。士子们的演讲或作文章,例有“黄帝子孙,神明华胄”,或“驱彼鞑虏,还我神州,”或“睡狮一醒,雄吼全球”之类的词句,成了反正初期的“八股文章”。总之,当时的社会面貌,自有一番文明气象。

这里,还有一事需要补述的。当广东宣告独立,革命党人举出湖汉民为都督的时候,报界老前辈的新会人林骏(字灿予),在他主编的广州人权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了这个都督人选的提出,须要通过民意机关的选举,才是正当手续,否则是不合法的。他主张把省谘议局迅速改组为省会议,都督人选,应由省议会加以追认,方符合民国的宪章精神云云。文章发表后,颇震动了时人耳目。林君并著有“宪法私议”一书,都十余万言,付刊发行。此书是民国最初期新会

人的第一部著作，可作为地方文物之一，也是广东文献之一，可不知现在有没有保存下来。

新会选出第一任国会议员黄霄九，谭瑞霖等，都是为袁世凯所收买的议员。新会人叫他们为“猪仔议员”。他们拥护袁氏，是助成洪宪帝制的狗腿人物。

江 门 商 会

五 十 年

钟 伦

解放前，我在江门商会工作过一个时期，对商会情况有些了解。早些年，我又分别访问了几位过去在江门商场上活动的老人，补充了一些资料；兹整理出来，以供参考。谬误难免，诸望教正。

(一) 江门商会组织及发展

江门商埠，因应本身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商业发展情况，于1902年(光绪廿八年)组成商会。

江门建立商会之前，有关商场上公共事务，是由六庙值事管理的。六庙，是指新市庙，大王庙、北极殿、师爷庙、石湾庙和文昌庙(这六庙是江门较大的香火庙，其他庙宇不属六庙范围)。六庙值事的权势很大，诸如地方上应兴应革、商务纠纷、庙尝处理等事情，由六庙值事论理，权衡，决定。六庙值事从什么时候产生、已难查明，只知他们是由各行业推选出来的。其中，最有势力的行业代表五人(有说不只五人)被推为庙的总理和协理。

六庙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新市庙是一向由范罗岗吕姓人士所据有，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家庙。每逢年节，例由吕姓先行烧香朝拜。外地来的别姓人虽比吕姓先到，也要让吕姓占先。这样，日子久了，意见渐多。于是，缸瓦业的人就倡议另建石湾庙，组成“义兴堂”，从此，他们就不再到新

市庙去进香了。至宣统末年，新市庙重修，庙前扁额直书“宏仁堂”，吕姓视为独有。以后，便逐渐形成这样的看法：以钓鱼台为界，东向的属义兴堂地界，西向的属宏仁堂地界。到了后来形势发展到要组织江门商务议事所的时候，由于北极殿近靠钓鱼台，地点适在六庙中间，于是，北极殿拱宸厅就被确定为议事所的所址了。

据说，江门商务议事所在江门商会成立之前，已存在十几年。议事所就是由六庙值事联合组成；虽不是所有六庙值事都参加，但各庙的总理和协理都是议事所的主要成员。其中李四是荷塘人，在江门开设荣合海味店，商人对他很为尊崇。在晚清，新任新会县知事例到江门东北局等团体拜访，经过荣合门口，也停辇下轿和李四相见。李四有兄弟在北京作京官，官场中人便把他当绅士看待。

到二十世纪初，在江门市场上，行栏（俗称牙行）益形发展。其中，南行、谷栏、果栏、油糖栏、杉竹栏、海产栏、猪栏等，在资金和营业额来说，为数都颇不小。当时海南和南路的土特产大都集中到江门推销，生意尤其旺盛。行栏商人经营有术，他们代客买卖，从中收取佣金（不同的行业按不同的商品性质和价格收取买卖佣金，一般是4%左右，例如海味和咸鱼，收取佣费是5%，果菜容易损耗，价格变动较大，收取佣费则高达12%左右），又利用“栏信”办法，招来生意。所谓“栏信”，是行栏给货客先贷出一定的贷款，等到货物运到江门，即行将贷出的贷款连同利息一并扣除；有逐次贷放的，也有长期贷放的，贷金额数和利息由贷借双方共同商定。这样，行栏和本地行商及产地商人挂钩，使得江门商业通过这样的维系日趋发展。行栏虽然放出了贷款，但却掌握了货物来源；货主用了人家的“栏信”，

一方面要履行双方的协约，在道义上也不能把货物运往别处出售，行栏也就达到了统治，操纵的目的。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附款规定开辟江门为商埠，帝国主义者公然闯进江门来了。这时候，外国货物可由香港迳直运到江门，在煤油方面，亚细亚、美孚，德士古等火油公司开始在江门委派代理店号经销，不久，又先后在北街和河南建立办事处并建设煤油仓库。其中外国资本也相继伸进魔手来。江门——香港线轮船开航了，原来江门民船西通三埠，西北通梧州，东走广州。此刻，西南出海又可通到香港、澳门，港商运来大量洋米、洋面、白糖、海产、肥田料，大小五金等。同时，华北，华中出产的豆、面、生油及京果杂物等所谓北头货也经由香港运到江门，这些货物再经江门分销三埠、梧州等地，江门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吞吐量的集散地了。

正是“货多客聚”，江门和附近各地的贸易往来关系迅速改变了。新会县四乡生意原来是以会城为中心，但因会城河水浅，水运量受到限制，加以江门经济日益发展，和四乡的贸易关系的中心也就逐渐移转到江门来。新会以外的邻近地区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迳直运到江门经销。两阳本来距离台城较近，但两阳的客商总还是喜欢把产品运到江门出售，江门批发户再采购倒运回到台山各地。同时，由于行栏采取贷出“栏信”的办法维系货物来源，许多地区的土特产就更集中输到江门。例如有名的沙井蠔豉就是一向交由江门安和海味栏经销的（记得1932年左右，广州商人曾经把沙井蠔豉争夺过去经营，由于江门蠔豉的市场比广州还大，加上安和栏和沙井乡有数十年来往关系，沙井蠔豉又返回到江门的市场上来）。

此外，由于江门适处四邑咽喉地带，光绪年间，在江门，鸦片烟土贩出贩入，数量日有增加。江港航线畅通以后，走私贩子益形猖獗。私货既有烟土，还有西药和许多贵重商品等等。这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又刺激了江门市场日趋畸形发展。

江门开埠之后，商业进一步发展，原来由六庙值事组成的商务议事所，已显得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了。到1902年，经各行业的代表人物集议，决定把江门商务议事所改组为江门商会，由各行业举出商董负责处理会务。

（二）江门商会历届会长人选和派系倾轧

江门商会组成，由商董互选刘文光为首任会长。

当时在江门商场上，以行栏资产最为雄厚，谷栏、南行、烟丝行和油糖行更为活跃。南行的区翰浓（广兴行司理），油糖业的梁心俊（裕德批发店司理），银钱业的莫子绅（粤安银业公司副司理，后恒安银号司理）以及水南的殷户谭鼎臣（黄恭发的亲家）等就是商会初期最具势力的商董。其中，尤以区翰浓潜力最大。他们认为，刘文光是新会巨富之一，颇有名望；同时，刘文光在香港开设公源米行，常住香港，在江门的時間不多，无暇过问商会的事务，正好加以利用，因此，推他为会长。这时期商会实际上是由区（翰浓）、梁（心俊）、谭（鼎臣）、莫（子绅）几个人把持。

刘文光会长任期多久，难以查考。第二届会长由何锦堂继任，直到清末。何锦堂是江门公源谷栏的主事人，兼办同兴五金店（江门最大的五金店），万就海味行，并和别人共

同掌握泰亨银铺（会城何家大塘祖尝），曾捐过功名。据说，何锦堂也不大过问商会的事，商会的实权还是操于区、梁、谭、莫等人手里。

何锦堂过后，李卓峰接任会长。李卓峰又名李泰，是当时罗奇生烟丝庄的司理。罗奇生在清末期间，生意鼎盛，既办出口烟丝，又经营油、茶，还兼办其他杂货。李卓峰上台，就是以罗奇生作背景的。这时候，南行还是墨守绳法，收取较多佣金，生意因而逐步衰退，油糖业却继续得到发展，因此，梁心俊在商场上扩展了势力，驾凌于区翰浓之上。油糖业的黄恭发也开始显露头角。油糖业的头面人物从第一届以来和其他大行业代表共同把持商会；到第三届，他们就更有力量地操纵了商会。自然，在整个江门市场上说，油糖业并不是第一个大行业，但是，这个行业的封建性很强。一百多年前，油糖会馆（旺德堂）建立以后，在江门经营油糖的批发店始终只限于廿四家。旺德堂规定：本行业的字号如有歇业，可以保留“行底”，凡要求新开业的，必须买进“行底”，有“行底”才能在本行业中做买卖，否则，本行业即联合起来加以抵制。“行底”时价不同，清末民初时，值白艮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不等。旺德堂这样用保留和承转“行底”的办法把油糖业筑起一道围墙，自然便于操纵市场。到商会建成，油糖业头面人物就利用本行业的封建把持，同时勾结海味行和糖豆行，联合组成三行，参加商会竞选活动。其他大行业，无力与油糖行争衡。李卓峰任会长后，忙于料理罗奇生本身的经营（民初，罗奇生港庄经营失败，牵扯到各地罗奇生联号），商会实权仍被掌握在梁心俊等人手里。一说李卓峰任内，梁心俊已经任商会副会长，掌握商会财政。